

逸堂四品

学海苦航

YITANGSIPIN XUEHAIKUHANG

刘逸生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独特的人生体验，读来仍使人
人所谓『夺胎换骨』、『点铁

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



的古



浮海苦航

YITANGSIPIN XUEHAIKUHANG

刘逸生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海苦航 / 刘逸生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62-3614-1

I. 学… II. 刘… III. 刘逸生—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2769号

策 划: 徐南铁
责任编辑: 李 颖
装帧设计: 李 颖 杨 靖
责任技编: 谢 芸

学海苦航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印 数: 1-3000册

ISBN 978-7-5362-3614-1

定 价: 28.00元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又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在写出蜚声国内的《唐诗小札》之后，陆续写了《宋词小札》、《漫话三国》，主编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两套共数十种，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在刊诸报章之外，并编辑出版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堪称贡献良多。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加上自传体回忆录《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署其名曰“逸堂四品”。兹因编者之命，作为小文，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亦间出己意，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

品之一：学海苦航

“学海苦航”虽然明显地源自“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过，“苦航”二字，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古人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

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老人处心之平实，由此可见。但是，当读完此书，我的感想却是——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子，在毫无师承，无人指点，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最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么一个故事，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而对于自学者尤其具有震撼力。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人终生自学，以成大器。一个“苦”字，道出了自学的真谛，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

少年时代，他为生活所逼迫，从十一岁父亲去世开始，过早走上谋生的路，学做木匠，当果栏学徒、书店店员、报馆后生，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学，无师无友，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

成年时代，他为工作所挤压，自三十岁进入《星岛日报》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报纸工作的繁重，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香港时，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建国后回到广州，则除了工作



之外，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紧紧抓住剩余的时间不放，即便偶然看戏，也常常提早离场……五十之年更遭遇“文革”，且一度被剥夺人身自由。

六十以后，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获得了宝贵的自由，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忙于著述、交游、吟咏、旅行、出版著作。七十以后，由于血尿之疾发生，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

我想，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第一，他记忆力好。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而直到中晚年，在闲谈之中，他对于所经眼书籍、诗词、人物一直保有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二十四史》中的具体位置，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而是记性真好。第二，领悟力强。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三，好书成癖。老人生来爱书，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他之于书，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薮、学问的海洋，他初则如海绵吸水，渴求不已，继则如鱼得水，涵泳其中，以为大快乐！老人晚年坐拥书城，心犹未足，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听到有好书，还是要买来浏览一番。第四，勤于动手。做学问的人，不单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老人的藏书中，常常可见夹着字条，或者剪报，是与书中内容有关材料，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做了有效的准备。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独具只眼，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第五，不盲从。做学问的人，能够不盲从，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老人深得此要，所以有《唐诗小札》的独树一帜，所以有百余年中无人敢为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和《龚自珍诗编年笺注》。

所以我想，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分，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的人生道路，几乎可以肯定，他必会在大学潜心学术。然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

品之二：唐诗小札

上世纪60年代初，当《唐诗小札》面世，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从此它一纸风行，风靡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唐诗小札》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

其实，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并非《唐诗小札》首创，在它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它。有趣的是，近二十年来，受《唐诗小札》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鉴赏辞典”，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却还没有谁能够把《唐诗小札》比下去。当“鉴赏”大潮过后，它以“刘逸

生小札系列”丛书之一再度推出，仍然很受读者欢迎。

《唐诗小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尚吟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两条：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深入”的理解，二是其优美“如散文诗”的文笔。说得都对，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它的富于“知识性”与“趣味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于《唐诗小札》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通俗地谈篇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各篇自具面目，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欲罢不能，更是谈何容易！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是办不到的，这就要发挥“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长处。照我看，《唐诗小札》的成功，一半有赖于此。这里所谓“知识性”并不等于有知识，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成了知识的奴隶，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只是些死知识。逸堂老人则不然。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他是主人，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他运用知识，挥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上天下地，纵横四海，而绝无掉书袋、说名理的冬烘气。

“趣味性”除了有个高低问题，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社会、对周围的生活，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把握不到现代人、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就无法吸引他们，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也只有徒唤奈何。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他们所以“喜闻乐见”，就只有靠实践，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舍此别无他途。逸堂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使他具备了对“趣味性”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其中就说到：“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经我的手，在《晚会》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诗词、漫画、照片、剪纸、谜语……之类。《晚会》的宗旨，读者一看就明白，用那时的话来说，就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强调了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潜动植，文武百工，无所不包。在近九年之间，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费了不少气力。”

我想，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羊城晚报》主持“晚会”副刊，对“知识性”和“趣味性”积累了深刻的了解，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唐诗小札》这样成功的作品？

老人晚年曾把他的“小札”与《唐诗三百首》相比，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无疑地，无论在选诗的眼光，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深入浅出”上，“小札”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唐诗小札》自1961年出



版，到今天仍然在再版，跨越了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而这一点是与《唐诗三百首》差可比拟的。

品之三：宋词小札

在《唐诗小札》一举成功之后，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宋词小札》的建议。但是，这一良好愿望，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据逸堂老人说，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而另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实在不好谈。

但《宋词小札》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当“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入“牛棚”，押送“干校”，又被暂时“解放”之后，在英德荒僻的山野之间，这沉埋已久的情结，便悄然萌动了。据老人回忆，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携回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之后，“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把唐宋名家的词作，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上百遍，终于豁然开悟。

《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好选本，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眼光比较开阔，选词比较全面，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风貌。现在，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上面布满红笔、蓝笔批语，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老人所做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词家、词作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予以分析、批评和纠正。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拓清古人（主要是清“常州词派”）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匍匐于名人篱下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直指其谬误；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弄不明白。也正基于此，老人穷山孤往，发愤自强，入虎穴以得虎子，并将其所得写成《宋词小札》一书，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疏通其意，揭示门径，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词家之心”。

老人曾说，《宋词小札》虽不似《唐诗小札》那样声名煊赫，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这绝非信口之言。因为诗歌自唐以下，流传不替，经过宋人、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但宋词的情况不

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元代、明代，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清代号称“词之复兴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然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技巧的认识，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一句话，清代词坛的新统，遮蔽了宋词的真面。由于种种原因，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群众基础不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宋词小札》，较之《唐诗小札》，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必须要以“解释词意”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解说的压力增加了，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内容相对狭窄，于是“知识性”、“趣味性”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这些客观原因，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唐诗小札》那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但是，话又说回来，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筚路蓝缕”之功，《宋词小札》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唐诗小札》之上，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不可多得入门书。

品之四：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说。他说考进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可以想见。其中《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他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他就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他保存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人，它可以使他成为“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逸堂老人对《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因此，到“文革”结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提要”说：

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



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它概括了《漫话三国》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去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

在读《漫话三国》时，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且看这些篇章题目：

关于大战若干回合……另一个“巧使连环计”……不问年龄的“桃园结义”……来历不清的关羽……奇怪的“过五关”……关羽之败，谁应负责？……何来的“五虎将”？……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诸葛亮为什么要痛骂王朗？……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魏延是降将吗？……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刮骨与开颅……左慈的魔术……鲁肃的真正面目……民间创造的“赤壁之战”……华容道的面貌……草船借箭的来历……

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一生阅读、探究“三国故事”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三国演义》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从近年易中天《品三国》，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三国演义》而声名鹊起，又得一证。我想指出，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逸堂老人的《漫话三国》中，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

2007年5月3日于童轩



《学海苦航》序

杨 奇

你可曾看过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颠簸着的帆船吗？远远望去，它老是停在那儿，动也没动；细看清楚，却是确确实实在行进中，尽管是那么缓慢地艰辛地移动，但只要掌好舵，经受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它终会有一天胜利地到达彼岸的。

知识的海洋也是无边无际的。古往今来，多少人沉浸在这个浩瀚的海洋中。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在一无师二无友的情况下艰苦自学的。“天道酬勤”，在我们国家里，自学成才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而刘逸生同志就是我所熟知的一个。

我认识逸生同志的时候，他正处在追求学问、探索真理的大好年华。我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学无专长的人，但自学求知的经历却同他颇为相似。我们都是小学未毕业就失学的；我们又都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而先后考进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还有，当他已在《星岛日报》熟练地从事校对工作的时候，我也考进了《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当校对员。正由于我在自学方面和校对方面需要向他请教，因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泡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论古说今。当时，他的苦学精神，他的广博知识，已经使我既钦佩又惭愧；如今，读到他的自传《学海苦航》，更是倍觉亲切。读着读着，多少往事一一浮现眼前，有些章节甚至使我的感情受到冲击，像有一股热力在我身上燃烧似的。

从《学海苦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辛勤自学的历程。正如作者四十四年前告诉我的那样：他从小“就痛切地感到知识的饥渴”。在小学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好几本古典小说。十四岁那年，当他还在《大同日报》当杂工的时候，这家报社仅有的一部书籍《辞源》，居然在他手里放出异彩——他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翻开《辞源》，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读下去。往后，他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并且养成了“读地图的怪癖”……所有这些自学方法，今天谈起来也许有人认为幼稚可笑，然而，正如作者说的：“笨有笨的主意”，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在这位特定的自学者身上，却是具体而真实的。

逸生同志读的书很庞杂，但有一根主线，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自学旧体诗词的步骤，先是唐诗、宋词，再就是清代几个诗词名家的作品，然后旁及元明戏曲，进而上溯先秦、汉魏六朝的诗赋。与此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从各方面丰富自己。他说得很对：“知识像是一个个网眼，同时又是一张网，网眼彼此之间都紧紧地联结着。”当然也是



他说得对：“广泛地吸取、储存，决不会把自己的脑子挤得不能转动，更不会把脑子挤破的。”就这样，逸生同志踏踏实实地学，辛辛苦苦地学，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知识，就汇集成为他自己的财富了。当逸生同志在《羊城晚报》主编《晚会》副刊，被海内外同行称誉为“杂家”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他是不可能如此胜任愉快的。同样，当逸生同志先后写出了《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以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受到读者欢迎的时候，我又想过：如果不是经过艰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征引丰富、串解通俗的著作来的。

从《学海苦航》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自学经历，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生平和思想的发展。人生的道路决不会像机场跑道那么平坦笔直的。逸生同志的前半生，经过一段坎坷的旅程，他的青少年时代是穷困、忧愁、不幸的，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摧垮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反而激励他自强不息，奋发向前。当他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切身体验过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他的视野比以前开阔了，对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毅然担任《正报》副总编辑，直接参加到党的新闻行列中来了。应该说，这是逸生同志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解放事业紧紧地扣在一起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他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工作中，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自己。“十年浩劫”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他从干校回到广州，为了夺回被“文革”浪费掉的时间，立即埋头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工作，他精神焕发，干劲不减当年。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逸生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自学，终于从一个报馆杂工成长为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现在由他自己来写总结性传记，我认为是合适不过的。这不仅为了回顾前半生，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广大青年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学成才的条件较之旧社会不知要好多少倍，然而，不论客观条件怎么优越，如果离开个人的艰苦奋斗，还是一无所获的。“文革”时期，曾经流行过“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侮辱，我们的远祖处在愚昧无知的时代，不善于同自然界作斗争，生活状况非常凄惨。只有当人类在生产中的知识被积累、传授和利用起来，才有今天的世界文明。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就更要利用全人类从古到今的一切知识。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才，让我们勤奋地读书，坚韧地学习，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吧！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1)
《学海苦航》序	杨 奇(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8)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5)
第十章	(197)
第十一章	(218)
第十二章	(251)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莱蒙托夫：《帆》

第一章

一个全能的鞋匠……小房间里的“风雅”……在火药般脾气底下……卖掉的小弟弟……《大学》《中庸》给我的苦头……女子小学校一年间……藤鞭的喜剧……沙丁鱼罐头与父亲之死……艰苦征途的发端

往古来今，常常出现一些灵童，有人就叫他“神童”，常是很使人惊异的。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下来才只有七个月，就认识“之”“无”二字；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刘晏十岁当上秘书省的正字；宋代词人晏殊七岁到京城应进士考试……都是听了使人为之神往的。然而惭愧得很，我却完全不是这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物。传说远古的女媧氏造人的时候，有些，她是拿泥土一个个地塑；有些，她便只用一截草绳在泥水里一拖了事。后者自然是归入大量而又粗制滥造之列的。看来我便是属于后一类，单从我在儿童时代就懵懵懂懂这一点便可以知道了。

我也没有很高的“家门”可以夸耀。人家祖上“历代簪缨”，做过一二品的大员，甚至还是“王孙贵胄”，阔气得很；我却正好相反，从没听说过祖上有哪个人在朝廷里得过一官半职，不但我自己的祖家没有，便是我母亲的外家也一样没有。

我也曾羡慕人家有个知书识字的母亲。像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虽然四岁成了孤儿，但母亲郑氏还能拿芦苇秆子教他在地面上写字；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的母亲段驯更是个诗人，几岁大的龚自珍，就由母亲教他念吴梅村的诗；我却又是正好相反，母亲是个文盲，不会读更不会写，自然也不会教我念书和写字。



门第我当然不希罕，神童也不敢想望，说我至今还有点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在我踏入学校之前，能给我多少一点文化科学的知识。

我出生那年是一九一七年，正是个乱糟糟的时世。欧洲大战还在拚命地打，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送了命；在咱们中国，已经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京还演了一场溥仪复辟的闹剧；广东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还有成帮结伙的“大天二”，兵和匪是很难划清界线的；鸦片烟、赌博和娼妓又如同瘟疫一样，残害着不知多少不幸的人。

农历六月初十那天上午，南方的气候已经进入酷暑，在香山县溪角乡一间非常平凡的房子里，忽然添了一个小男孩——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好笑，这也值得浪费纸张笔墨吗，干脆不写好不好？然而继后一想，中国古典戏剧向来有个习惯，一个角色出场，总得向观众们“自报家门”：小生姓某名某，字某某，本贯某地人也。下面才是正文。这种老规矩，似乎也有它的道理，所以我还是照章办事了。

我既然没有“夙慧”，所以直到七岁入学之前，还是“浑浑噩噩”，身边的事情连同自己的事情，事后什么影像也没留下来。偶然有几件事情，是以后母亲在闲谈的时候透露的，但也无法唤起我的印象。我常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憾事。假如人一生下来就能够有记忆，连吃奶、溺床、学走路、长乳牙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那该多好。婴儿时候父母亲的笑声该是最甜蜜的；亲人们的抚爱该是最亲切的；而自己的一个笑靥、一声啼哭也该是最无邪的。这些，给以后的我会留下多么美好甜蜜的忆念啊！可惜这些全都不留痕迹了。待到能留下痕迹的年纪，情况却已经改变，连父母亲的笑容都不像往常，亲人们的挑剔也多起来，不是说长得丑就是说长不高，不是说太顽皮就是说呆头呆脑；加上还有些人事变迁，生的生，死的死，去的去，散的散，婴孩时期的旧事，当长一辈的人重新提起的时候，自己除了茫然，还剩下难堪的怅惘。

姑且举一个例子吧。

大概是我一两岁的时候，父母亲带着我到了县城——就是如今中山县的石岐市，赁了人家半间房子居住。据母亲后来说，赁了另外半间房子的有个二十来岁的女人，模样长得很俊，不知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外室。她丈夫只是偶然回来一下，住两天就走，所以平时是很寂寞的。大抵就是因为寂寞吧，她一见我，就喜欢得了不得，常是老半天把我抱到她房间去，把我当布娃娃似的耍弄；上街的时候，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拿着手绢、钱包，东家店子转一转，西家店子逛一逛，少不得又是糖果，又是点心，硬是塞到我的嘴里。就这样拎着我这“包袱”满街跑，半点也不觉得累。我母亲呢，不但忙着家务，还得学着用缝衣机缝鞋面，乐得把我脱手给她。



>>

刘逸生
与母亲合影

可是，不到一年，突然有一天，她搬走了，也没有留下地址。从此之后，用一句陈话，就是“杳如黄鹤”，无影无踪。真是应着大诗人苏东坡这几句话：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要不是母亲后来告诉我，我是完全不感觉到有这回事的，即使告诉我，她到底是怎么个模样，胖还是瘦？高还是矮？仍旧模糊一片；然而每当想起婴年这段遭遇，又总有一种惘然的感觉。正如评论《水浒传》的金圣叹，得知书里有个武松式的头陀，无端在人肉作坊里丢了性命，却无从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不免再三惋惜一样，在人的一生中，又何尝没有自己无法追寻的人物。受到有形的爱怜，而自己却混混沌沌，事后无处追寻，在婴儿时候是常会有的；至于受到默默的爱怜，或者是暗中的保护和帮助，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在一生中肯定也是有的，可是，他们（或者她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想说，别人也不愿意说，然而实在肯定是有的，自己却完全不知道，想起来就更使人为之惘然了。

直到我满六岁的时候，我的脑子才发育到能够贮存信息的程度。换句话说，是有了记忆能力了。那时候，父亲已经到了香港，在油麻地新填地街租了一片门面，开了一家小作坊，是专门给皮鞋匠人制鞋楦的作坊。

我开始能记忆了：油麻地虽说是九龙半岛的中心地区，但还十分冷落，除了弥敦道、亚皆老街两三条干线比较宽阔之外，都是些狭窄的马路。其中，上海街还比较热闹，像样的商店还多些，我家所在的新填地街，就颇有点荒凉的样子了。住的人不多，而且都是些穷苦人家；商店冷冷清清，大抵是勉强撑持门面的小店铺，自然找不到大公司和大酒家。我父亲正是贪图房子的租金便宜，才找到这地方落脚的。

假如有人问我：“你认字的时候，最初认识的是哪几个字？”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刘祥盛鞋券铺。”

这个回答自然有些奇怪，却又是事实。原来在父亲的小作坊门口，有两根支撑着骑楼的水泥柱子，方形的，直径约有四十厘米粗细。父亲请人在每一根柱子上都漆了六个大红字：“刘祥盛鞋券铺。”我还没上学之前，每天都看到这两行大字，再听父亲一念，就记住了。所以说这是我最早认识的几个字。至于更早之前，有没有人教我“一、二、三”呢？因为实在记不起来，也可以说没有吧。

我自然不知道这六个字里竟有一个是写了别字。许多年后才知道，



“鞋券”的“券”不该这样写，要写做“楦”，更早的时代还写做“楦”。它是制鞋的时候套在鞋帮里做模型的木头。它的来源很古，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楦”字，后来又出现“楦”字，大抵是个谐声字。这个“券”字也是只取其声的。文字学家当然说这是写错了。不过写在招牌上，目的在招徕生意，似乎又当别论。如果在招牌上写成“鞋楦”，恐怕十个鞋匠有九个不认识；如果更写成“鞋楦”，以求古雅，那我敢肯定，一千个鞋匠也找不到一个会认识它的了。所以我至今还不敢说“鞋券”是写错了字。

我父亲是个精瘦的汉子，身量不高，人却精明，学得一手好手艺。通常，皮鞋工匠只管制鞋子，不管造鞋楦的。造鞋楦的手艺要精细得多；而且因为行头窄，容不下太多的工匠，所以学制鞋楦的人也不多。我父亲却既懂得刨制鞋楦，又会裁制鞋面和上鞋掌，在这行业里算得上是个全能手。

他为人也不懒，我常见他天不亮就起床，扭开电灯，跨坐在工夫凳上，双手拿着弯刨，孜孜不倦地修饰着楦头。他造的楦头，款色不少，赶得上时髦，生意也算不坏。

制鞋这一门，染上坏习惯的人多的是。可他既不抽烟，也不“拈花惹草”，更不赌钱，烈酒不喝，只喝些补酒——茶几上经常放着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双蒸酒浸着一整头狸猫。能够这样洁身自爱的人，在那时的皮鞋行里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

他也不是没有嗜好的人，他喜欢新鲜的玩意，也爱讲排场，充风雅。他到香港不久，挣了些钱，就把自己的卧房装饰得很讲究。一种四柱到地、上面安了金顶、下面装着万向轮子的新式大铁床，在那时一般人家也算是体面的，他的卧房就有。时兴的大镜面五桶柜，用的是上等木料，还满雕着飞凤、梅花，十分精致。他也买了，就放在铁床旁边。

他还有点附庸风雅的脾气。我还记得墙上挂了一副拿瓦筒那么粗细的大竹剖成两半，上面刻了行草的对联。联语是这样写的：

奇石寿太古，好花春四时。

他是不是懂得欣赏书法，我不知道；可以肯定地说，他未必知道什么“寿太古”。

最使人奇怪的是，不知从哪里买回来一张行书的横披，镶嵌在镜框里，居然是两首很有点文采的七律。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①：

横槊中流望八荒，澄清依旧仔肩当。